

●语言哲学(教育部特色栏目)

罗兰·巴特对人类个体的符号学构建*

王玉华

(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立足于人类个体的生活实践,从生理层面和精神层面对人类个体的生存境况和未来发展进行深度的思考和探究。在生理层面,巴特从语言和身体两个方面揭示去中心化后的人类个体的生存状态,探寻在失去主体特权之后构建人类个体的生存意义;在精神层面,巴特借助文化符号学在对意识形态去神秘化的过程中激发人类个体的能动意识,对基于共同价值的人类文化意义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建构。研究巴特的符号学思想对人类文化的认同和传播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效能。

关键词:罗兰·巴特;符号学;人类;个体;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23)04-0105-7

DOI 编码:10.16263/j.cnki.23-1071/h.2023.04.015

Views on Human Individuals in Roland Barthes' Semiology

Wang Yu-hua

(School of Western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Roland Barthes' semiology, based on human life practice, deeply ponders and explor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human individuals at the physiological and spiritual levels. At the physiological level, Barthes reveals the existential state of human individual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and explores their survival significance after losing subjective privilege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body; At the spiritual level, in the process of demystifying ideology, Barthes intends to stimulate the initiative of human individuals by means of cultural semiotics and has been actively exploring and constructing human cultural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common value. The research of Barthes' semiology plays a profound enlightening role i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human culture and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mproving the dissemination efficiency of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Roland Barthes; semiology; human; individual; cultural dissemination

1 引言

“现代主体恰恰死于后现代的个体充满活力的时候”(罗斯诺 1998:78),在现代社会的境况中,原本的理性人类主体早已退隐,仅存的就是人类当前的生存个体。主体没落和退隐的过程是主体的自我撕裂和自我解体,但更多的则是主体对今后生存状况的自我反思。摒弃了虚无自大心理

的人类个体逐渐从迷惘僵化中复苏,他们从团结互助的共同体中获得心理能量的驱动力,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因此,重构主观性意识的人类个体是一个适合取代主体而生存的形式。

20世纪以来,哲学家们探索的不同理论范式加速传统人类主体离心化的过程,同时也在积极构建人类个体并探寻人类个体的生存状态。罗

* 本文系黑龙江省艺术科学项目“罗兰·巴特艺术批评理论研究”(2021B055)和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约瑟夫·海勒小说中的后人类伦理研究”(WY2021042-C)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电子邮箱:gracewangyuhua@126.com

罗兰·巴特^①的符号学是这个思想大潮中不能被忽视的一隅。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与他的一生如影随形。符号之于巴特,既是一件外在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可以让他畅游在结构内外,游刃有余地解构再建构,以达到其享乐和愉悦的宗旨;同时更像是与他融为一体的内在的目光,宣泄他的真实情感、生活体验和人生态度,在他看来似乎人类世界中的一切都可以符号化。

2 人类个体的语言符号系统构建

从索绪尔的语言系统到巴特以此为基础试图建立的语言符号结构,都从方法论的角度以科学性的逻辑规则将人类从中心主体的地位予以驱逐。传统的人类主体秉承着笛卡尔“语言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的观点,在很长的时间里笃信思想高于语言,语言是人类主体的附属品和交流工具,这也是人类确立自身主体权威的根基之一。直至20世纪,维特根斯坦用语言划界说打破这种凌驾于语言之上的主体中心意识。而巴特孜孜不倦地追求的更是一种语言在文本中的自由。他不在意语言表达的社会意义和功用,而感兴趣的是语言本身的结构和风格。巴特认为,语言并不是只供人类交流使用的工具,而是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符号承载着纯粹的意义。语言以自身的意指关系构建人类语言符号系统,如此才能表达意义、传达情感。语言并不会因为交流、阅读等目的而被人类的主体性所支配,“主体性是一种完全的想象,人们设想我以此来充塞文,然而其虚假的完全性,只不过是全部用来构织我的符码的痕迹而已,因此,我的主体性说到底只是诸类定型的笼统表达”(罗兰·巴特 2016a:14)。巴特认为,主体性只是一种语言系统中的装填,而主体只是其中一个游移不定的存在。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巴特完全将语言作为重心来进行研究,但是这个时期他试图建立的语言系统更像是一种自成一体的、严谨的科学体系,着重于自身的规则和结构,与人类世界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到了70年代,语言似乎不再是巴特显性的兴趣点,但实际上语言并没有退隐,反而是以一种与人类的身体和情感联系更为紧密的姿态继续活跃。身体欲望被引入语言从而形成语言的宣泄和播撒,可以说身体和语言都是自然形成且自主运作,并不受人类主体的主观意识左右,这意味着它们与人类主体的脱离和独立状态。语言从前期结构主义的“先锋”变成解构主义的“革命者”,它勇于摆脱语法规则的桎梏,以更独立自由的状

态在无限播撒和蔓延。同时语言又被注入人类的情感和欲望,从而不再是冷冰冰的符号和模板,而是实现与人类个体的共生和共勉。

巴特实践中的语言形式也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人类个体的生存状态——片断(也有评论家将其称为断片)和裂隙。片断是巴特一生最为钟爱且不遗余力进行实践的写作方式,他曾在《罗兰·巴特自述》中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宣告,“我对细节、对片断、对涌动有着先决的(首先的)兴趣”(同上 2006:52)。传统的写作方式要求严格的连贯性和清晰的总体性,要求用具备完整等级体系的句子进行写作,巴特则以嬉戏的态度打破作为逻辑形式和理性形式的论断性句法和话语,对片断的生产深度沉思和自恋,在片断的裂隙中获得自我满足和快乐,片断也是巴特质疑和抵制逻各斯中心的最佳手段。传统写作体制森严,拒绝甚至打压异质性的语言符号,这就意味着权威、秩序和规则的禁锢,而片断则是打破这种禁锢的利器。“断片则将总体性撕开裂口,它摧毁总体性的堤坝,让那些异质之流自由地涌动。”(汪民安 2005:212)片断以一种毫不避讳的形式打破原本循规蹈矩的线性叙述方式,使之产生裂隙,将不同缺口的细节作为符号重新进行并置和拼凑,从而使恢复自由的语言符号在裂隙中获得新的生长点和活动场域。巴特的片断与裂隙在哲学上与解构主义是同质的,被解构之后的人类个体也同样是片断的状态存在。传统主体被颠覆、去中心之后,“主体死亡”“主体退隐”和“主体消解”之类的言论此起彼伏,无外乎是想体现革命的彻底性,想让主体从世界上彻底灰飞烟灭。然而,这些说法都未免不够准确。主体即便让渡中心地位、失去操控世界的权力、褪去盛气凌人的气势,即便已经退到边缘、散了架、模糊了同一的面孔,但主体并不会凭空消失,它们仍然在自己的位置上留有印迹。巴特相信只有片断才能够在文本和生活实践中表达一些正在发生的、深刻的事情,因为人类主体正处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中,即使人类设法统一自己的语言,也无法避免与各种片断化的过程进行斗争。因此更准确地说,片断应该是后现代境遇中人类主体的存在状态。弗·詹姆逊(又译詹明信)就曾经用“成堆的碎片”来形容主体文化所能产出的唯一东西。(让-弗·利奥塔等 1999:50)主体内部相互排斥的本质决定断裂的产生和碎片的最终形成,主体逐渐失去实质性的意义和内容,变成空洞的片断,因此只适合在空间主宰的裂隙中生存。虽然无法保有内外和谐同一的整体性和延

续性,意识出现断裂、精神焦虑失常,但是摆脱同一性束缚的人类个体却获得重塑和发展的自由,能够在后现代社会的裂隙中找到新的存在感和生长点。

巴特在写作实践中也致力于实现一种脱离人类主体摆布的写作方式——“零度写作”。他提倡文学创作应该从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中剥离出来,进行一种纯粹的、近乎机械式的写作。整个写作过程中只有语言符号的跳跃和嬉戏,不必再去关注说话的主体是谁、说话人代表什么样的立场、说话人本身是什么样的背景、他的背景是否影响写作等因素。写作产生的文本不再被人类主体所拥有,意义也不再被人类主体所选择和限定。“它存在于文学的惯习之外,它是按其本性而非由于选择而成为社会性对象的。”(罗兰·巴特 2008:8)随着人类主体在写作过程中的退隐,一切开始回归语言符号的本真。语言不必再被赋予某种身份和目的,它可以在完全匿名的状态下实现自由的发展,语言的价值只在于它自身的运作形式和功能,而不在于它对写作主体的服务功能。

作者失去主体的特权并从文本中退隐,那么读者会取而代之成为文本解读的新主体吗?巴特驱逐写作主体的操控、提升读者的体验感,并不是为了将读者树立为另一个语言符号系统中的权力主体。“文之后,无主动者(作者),文之前,无被动者(读者);无主体和客体。”(同上 2009:21)在巴特的目光里只有以语言符号为基础的文本才是应该受到关注的核心。文本为人们提供浩瀚的阅读空间,作为作者和读者的人都无法命定也不必纠结某种阅读的真理意义,更不必为了各自坚守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而焦虑甚至争执得头破血流。读者的解读只是将写作的痕迹汇聚在一起,构成一个众声喧哗的空间,其中并没有哪一个声音能够占据中心,因此读者始终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于文本世界中而不会摇身变成新的主体。巴特的阅读中存在的只是语言符号的自由流通和嬉戏,文本中的语言符号与阅读者诠释中的创造性和独特性之间存在着涌动的张力,在文本获取趣味的同时,读者个体也可以在语言符号的不断穿越中和个体意义的不断生成中得到放松和愉悦感。

巴特对语言的兴趣是狂热且显而易见的。他热衷于用语言描述一切细节,他的语言美妙而独特、感性而温暖,他的语言不会受到所描述事物的性质和主题的影响,无论写作对象是细腻还是粗犷、是高尚还是鄙陋、是严肃还是通俗,在巴特的语言符号世界中都能得到鲜活的描述,而这些都源于

他对人类个体境遇的思索和人类体验的探寻。他将语言视为身体获得快感的一种方式,人类的语言和身体的爱欲一样充沛而丰富。

3 人类个体的身体符号系统构建

巴特在符号学研究所关注的人类,既不是社会实践中具体的人类个体或群体,也不是具有自我中心意识的人类主体,而是聚焦于客观存在着的人类身体。

身体曾经在巴特专注于研究语言科学体系的阶段被彻底遗忘,因为“以语法为根基的文学科学无法容忍感官性的身体”(汪民安 2016:149),二者完全是分崩离析、水火不容的状态。到了70年代,巴特的研究重点已经从语言转移到身体,身体被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自由。语言与身体的关系也从前半段的视同水火过渡到如今的彼此交融。身体“处于文之符号、一切语言的招引之下语言来回穿越身体,形成句子之类的波光粼粼的深渊”(罗兰·巴特 2016a:3)。在巴特看来,身体和语言相互关联,身体产生语言,身体用语言在倾诉,身体充满向往语言的激情。

虽然巴特从符号学的视角用人类的感官体验来解释人类的身体,但是他并没有把它看作隶属于某个人类主体的附庸,也就是说巴特并不关注是谁的身体、是哪类人的身体这类问题,而是把身体看作独立于人类主体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整个的躯体是无人称而言的”(同上 2006:143)。身体并不完全受主体意识的控制,它的存在状态并不取决于表面上拥有它的人类主体的理念,也不只是为了服务于人类主体的需要而存在。巴特认为,“身体之悦不可简化为生理需要”,“我的身体并不拥有我所拥有的同样的理念”(同上 2009:21)。那么,摆脱从属地位、以独立姿态存在的身体会不会就此被提升到更为核心的位置呢?巴特认为,这种身体不会取代人类主体意识而成为新的中心,因为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从一而终的、永恒的主体,暂且被描述的主体也不具备其固有的中心地位,而是“不得其位”“不合时宜”地漂移着,因此身体在脱离人类主体意识控制的同时自身也不会成为新的主体。但是,它又不是一具完全偏离中心的、僵硬的躯壳。身体可以徜徉在文本符号中感受游戏的愉悦,可以沉浸在阅读中检验欲望的快感,可以活跃在写作生产中焕发出创造性的魅力。身体各处都充满着微妙的经验,为不同的人类个体提供专属的感性体验,身体细致的生物学特性能够提升人类个体的生活感悟。

巴特无意用“身体主体”来替代“意识主体”，无意于重新树立新的主体和新的世界中心。他在后期将身体引入文本世界，身体与文本同为多元性的开放空间，充满意义的无限延宕和书写的无限生成。因此，人们在阅读和分析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为了获取某种主体性，而是“独特性”，是令他的身体区别于其他身体的独特性。独特性来源于差异，无论是文本还是身体，巴特都十分关注差异和区别。虽然追求享乐是共同的目的，但是由于体质和习惯不同，因此在体验过程中身体的个性意识是不同的。而身体的差异和独特性清晰直观地透射出人类主体的根本性差异，只有认识到差异的潜力，才能完成对身体的全面认知，才能更好地适应自己身体的“悦”和“痛”。身体个性化的私密特点能够促进人类个体符号系统的多元化发展，丰富人类个体的生活体验。

可见，巴特对身体符号的理解，也拆解了原本的人类中心主体所坚守的秩序。笛卡尔的“我思”是用来树立人类主体地位的根基，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使“我”成为认识论中的决定性主体。根据笛卡尔的说法，“我思”应该是万能的、纯粹的、不依赖任何其他物的。然而，在心身二分的前提下，“思”又需要身体作为支撑，身体为了“思”就必须存在。这种认识论转向的不完美性和不彻底性决定身体呼之欲出的潜在能量。笛卡尔的认识论中传统的人类主体坚信自己具备理解和操控物质世界的的能力，因此自然地就成为世界万物的轴心，那么就需要以主体意识为圆心建立其它事物的秩序。也就是说，传统人类主体认为自己是秩序的主宰，自然界的万物和秩序都以思维主体的“我”为基点研究推演出来，而巴特一直致力于用身体来对抗秩序和规则。与巴特的大半生如影随形的肺结核让他在疗养院里过了很长一段秩序井然但是枯燥、孤独的生活，因此在他的印象中，生活中的秩序和身体的状态是连接在一起的，身体符号让人类不再以控制秩序的成规而存在，自然也失去“立法者”的地位。他打破人类中心主体的理性和秩序，使传统的主体遇到危机。而人类在逐渐摆脱主体原本的舒适状态之后，开始思索世界的新秩序和自身所处的位置，开始冷静面对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寻求和谐共生的个体生存状态。

4 人类个体的文化符号系统构建

如果说巴特关于语言和身体的研究是从生理层面对人类个体状态的思考，那么文化符号学则

是他将符号学的功用和价值延伸应用于人类社会思想意识层面的一次革命性的实践，让人们看到符号系统在语言领域之外的魅力。

巴特的文化符号学着重于对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表征进行符号学解读，而其初衷则是揭露和阐释当今社会中人类个体所面对的某些文化怪象。传统的人类主体以实现自身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以个人的意愿和标准来约束自然事物、改造客观世界，最终成为一个违背自然规律的独裁主体。如今，被祛除主体光环和地位的人类个体进入一个谨小慎微地去适应世界客观规律的状态，处于一个被动、消极的生存状态中。他们终日缠绕在生活中一些“神秘”的“自然现象”中感到迷惘、无法分辨，于是选择欣然接受。而实际上，这些神秘现象的构成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是制造者有意将文化现象通过神话包装成“自然现象”，从而误导人们想当然地接受，并形成流行文化。对于这种现象，巴特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将其称为“神秘化”。由于“神话的功能是扭曲，而不是使之消失”，因此神话的构架和意象仍然留在那里，只是丧失或部分丧失原有的意义，或者是原有意义被异化。这种“神秘化”隐藏的宗旨就是用神话的外壳植入某种意识形态的现实，目的就是通潜移默化的渗透方式诱导人们将隐藏的意图当作理所应当的事实而深信不疑，从而达到按照他们的要求重构人类主体的目的。

为了将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去神秘化”，以唤醒人类个体的能动意识，巴特借助语言学符号系统提出意指结构，以此来揭示“现代神话”的运作机制，让人们意识到“自然的”和“历史的”之间的转换误区及隐藏的特殊目的。“神话负有的责任就是把历史的意图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偶然性以永恒性为依据。这一步骤眼下也恰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步骤。”（罗兰·巴特 2016b: 173）被巴特所推崇和借鉴的索绪尔的语言意指结构是纯粹的语言层面的符号系统，由表达层面的能指和内容层面的所指构成，每个层面又分别包含形式和内质。由于形式这个层面几乎可以完全依赖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描述，因此相对恒定、单一、简明。而内质层面由于必须依赖语言学以外的前提加以描述，因此要丰富、复杂得多。同样的形式可以有不同的内质，本系统的所指可能会在另外一种内质中得以体现，对象系统所包含的内质体现在意指功能上可能只是片面的。凡此种，都让内质在符号学系统中的表现变得扑朔迷离，而内质的复杂性又使它极容易被利用为蒙蔽

人类理性意识的媒介。

在巴特看来,人类日常生活中的物品都可以被看作一个符号系统,其系统本身具有的不介入意指作用的表达内质就是这个物品的自然属性和功能。这个内质是自然化的、与生俱来的、很容易被认知的,这也就是物品的语义化过程。这个过程是必要的,它让物品变成可理解的符号从而被人类文化所接受。而另一个被特意用来进行意指的内质则是人为的、由某种特定的社会目的决定的、纯操作性的。在人类社会,没有任何人为意指功能的内质是不存在的。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物品符号会不可避免地被重复功能化,而这种重复功能化的作用与最初纯粹语义化的作用完全不同。它涉及某种人类学技术的综合运用,与隐蔽语义学机制相结合,达到某种含蓄意指的功能,而物品或现象的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往往通过隐喻的指涉关系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直接意指记号系统记号指涉关系的确定内容或意义隐含了含蓄意指记号系统记号的指涉关系中所指负载的某种社会文化意义或意识形态意义。当人们接受直接意指记号系统记号确定的指涉关系所表达的不证自明的内容或意义时,也就无意中接受到它的隐含之意。”(龙佳解 陈磊 2017:171)意识形态借由符号系统中语言内意指作用的自然性和真实感来隐藏其本质意义,从而获得集体认同。

巴特试图用符号学解码的手段唤起人类个体对资产阶级文化现象意指功能的警惕和辨别。巴特的文化符号学范式通过将人们生活中的文化现象符号化,通过揭示意义生成的原理和神话形成的机制,祛除环绕在这些事物外面的看似正当的神秘表象,将它们还原到历史的本初,这样才能清晰地认识其真正的本质属性,也就是认清文化内部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信息。“在巴尔特看来,文化内部的符号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而是纠缠在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复杂网络之中,他于是紧紧抓住那些明显带有单纯无知或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中立的日常事物……来揭示其中潜含着的道德因素。”(肖伟胜 2016:178)只要纯粹的事物被添加上社会功用,就可以通过暗示的方法转化为某种开放的向度来表达和言说。如此,人们就会意识到,这个文化中的事物既可以表现为纯粹的事物本身,同时又暗地里成为特定社会阶段意识形态传播的媒介。

“在巴尔特眼里,大众文化背后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核,而不是简单的表面形式。”(孙秀丽 2015:75)关于意识形态与人类主体的关系,阿尔

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偏向于社会职能的表述体系,着重于表述人类与其生存条件之间的想象关系,因此它所指向的是人类认知中的现实表象而非真正的现实对象。同时,意识形态又具有“物质性”,因为它通常要借由国家机器来实现,因此意识形态对人类主体的影响和塑造必然牵扯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而巴特正是力图用语言符号分析的方式拨开迷雾,揭示神话劫掠原朴语言的过程和真相,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神话的特性就是将意义转为形式,而统治阶级已然窃取形式匿名填入自己主观的认知、情感和喜好,再借由这种形式和表象在社会上广为传播,由此悄无声息地将自己所倡导的终极意义渗透到社会大众,于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规范获得普遍性的认知和实施。巴特让人们意识到日常生活与神话表象的重叠,意识到自然表象下面隐匿着的人工操作和目的,意识到资产阶级控制下符号的欺骗性和双重性。巴特指出,神话就是一种“言说方式”,问题在于由谁来言说?言说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如果由资产阶级来言说,那么就应该警惕他制造神话的目的,意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利用大众媒介方式重构“今日神话”的真实意图是为了隐藏剥削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特性,是对人类真正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剥夺。人类个体如果持续深陷在这样一种虚假的文化氛围中,就会逐渐失去积极思维与能动性,变成繁荣复杂假象背后处于意识形态无形控制中的寄生者。而制造这种虚伪文化神话的人就会通过这种幻想潜移默化地实现对人类个体思想和意识的控制,使人失去重要的否定和批判功能。

巴特以神话符号分析方式开启的“去神秘化”的过程,是语言符号工具与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完美结合,它含蓄内敛地揭发资产阶级的神话学伎俩,警醒和激励人们对于文化现象本真的探寻。人类在失去主体光环之后,不应一味沉溺于自卑、彷徨、患得患失的精神状态中,而是应该积极思考、建立清晰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积蓄守正创新能量,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判断力和思辨力的个体。只有这样,新时代的人类个体才能够清醒地认识并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全球各个领域的无形渗透,从而建立真正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发展的文化符号系统。

5 巴特个体符号学构建对人类文化传播的启示

巴特的符号学在脱离起初文学研究的土壤和

藩篱之后,将炽热的目光投向人类社会中繁复驳杂的大众文化现象。从理论序列和批评实践来看,人类文化是巴特运用符号意指系统来进行审视和思考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推动其符号学思想的不断发展和日臻成熟。

人类个体是文化的基础单位,反之,文化是人类个体反应和反思的创造性结果。“在动物学术语中,个体就是一个单位……。同样,从功能上进行考虑时,考虑的也是个体,因为个体,只有个体才具有冲动、反应和机制,我们把它们的客观表现称之为文化。”(克拉克·威斯勒 2004:258)。但是,被置于孤立个体之上的文化是缺乏希望和发展动力的。当个体由于血缘繁殖等原因聚合为群体的时候,人们会发现,基于生物学特征而形成的人类群体,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和解释似乎更为恰当。人类个体的先天遗传学变异决定群体先天素质的差异,而文化作为这种先天素质功能所创造的产物,必然具有不同的精神特征。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显而易见,各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程度也不均衡。那么,文化与人类的遗传具有同等性质的进化吗,是否存在顶端和底部的文化层级?对此,巴特的符号学为人们提供一种阐释、理解文化差异的途径。

巴特在解构主义符号学研究中不再执迷于追求符号所指的终极意义,而是关注符号的能指本身。这意味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原本确定的、单一的、稳定的关系出现断裂,符号是不确定的、开放的,符号之间是平等的、自由流动的关系。没有哪种符号能占据中心成为整个系统的法则,他们都只是一种言说和书写方式,甚至只是意指过程中流动的痕迹。因此,任何阶级的人类个体都不会成为文化的主宰,同时也不会被某种文化所挟制。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阶级,都没有决定符号终极意义的权势,没有控制和支配其它民族文化的权力,自然也不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优越文化。巴特在《符号帝国》一书中以日本为例,将日本文化横向分解为26种符号,通过符号系统的意指作用,揭示东方文化的意蕴,汲取东西方文化符号差异和变革的启示。“在对东方的考察中所能追求的,不是种种别样的符号、一个别样的形而上学或一种别样的智慧(这似乎也十分令人向往),而是在符号系统的种种属性中出现某种差异、变化、革命的可能。”(罗兰·巴尔特 2018:2)这本书的一些标题已呈现出巴特对日本文化的理解,“未知的语言”“无言”“无中心的膳食”“城市中心,空无中心”“无地址”,等等,日本文化符号中“空”与

“无”的特点体现出中心与主体的欠缺。巴特通过揭示日本文化去中心、轻主体的平和气质,批判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毫无理由的优越感。西方文化妄图否定文化差异,以自然化的方式将自身文化以及强制性蕴涵的意识形态渗透进入其他民族的大众意识之中,从而转化为被全世界普遍认同的价值。而实际上,从巴特的符号学视角来看,不同的文化仅仅是符号系统中规范的差异,没有哪种文化是毫无瑕疵的完美范例,没有哪种文化适合居于中心地位,没有哪种文化能够凌驾于其它文化之上。通过符号分析的方式来解读和诠释文化,能够让人们看清并抵制文化霸权现象。人类应该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而不是妄图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从而形成以自我为尊的世界一统的文化氛围。巴特开放、多元的符号学视角有助于推动文化的相互尊重,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

巴特符号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实用性,他在著作中尽管也对符号的原理做过细致的阐述,但他更注重实践研究方法,更重视符号学的方法论价值。他以符号学的视角关注人类日常的生活点滴,热衷于利用符号学的策略、方法来阐释社会现象,同时将这种对社会文化的关注和反思作为自己学术发展的动力。巴特的这种立足解决现实问题的积极态度也为我们探讨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式提供很好的启示。推进中国优秀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不能单靠喊话式的理念宣传,而是需要考虑到世界上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政治环境等复杂因素,需要立足于各个国家、社会现实的差异性,寻找双方话语背景中彼此相通的价值角度,寻求适合不同民族特点和民众思维方式的传播话语体系,开发能够适用于不同国情的多元化传播模态,以亲和友善的方式、自信谦逊的姿态促进中华文化与全球其它文化体系的平等交流。巴特在符号学实践中,尝试用符号学系统作为标准来解码阐释社会文化现象,同时对文化差异给予高度的理解和认同,这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求同存异的原则不谋而合。全球各民族的文化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应以兼收并蓄的胸怀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交流,同时坚信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积淀,坚信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及所蕴涵的强大精神力量。只有具备足够的文化自信,才能不断激发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活力,才能秉承开放包容的态度持续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效能。

巴特利用符号学分析方法在符号和人类文化

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关系。人类个体与文化的关系是相互阐释、相互依托的。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不可能离开文化的滋养,否则将会精神贫瘠、萎靡困顿;同时,文化也需要人类的认同和尊崇,才能够获得自信而继续完善和传播,文化符号的创新和与时俱进也是人类主体性的张扬。人类通过理解和借鉴符号意指作用可以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层意义,感受文化传递的魅力,建立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自信心,并推动民族经典文化的传播,以提升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6 结束语

巴特希望符号学的作用是引出现实,启示现实,而不是作为一种固定僵化的构架来规划和解释现实。他无意将符号学做成四海皆准的模型或者公式来让人们效仿和追随,而更愿意用符号学的方法和体系给人们提供感受世界、洞察生活的示例,鼓励人类个体积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在生活中进行实践。其实,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努力,无论是理性还是感性的选择,这些都是非主体的人类个体进行的生存尝试。只要有这些可能性,人类就不会失去再生的价值。只有不断地去尝试新的可能性,人类个体才能够在更大可能性的范围内进行并实践更为科学合理的选择,人类的未来发展才会具有更加光明的无限可能性。

注释

①罗兰·巴特又译作罗兰·巴尔特。

参考文献

- 波林·玛丽·罗斯诺.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 Rosenau, P. M.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M].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 克拉克·威斯勒. 人与文化[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 Wissler, C. *Man and Culture*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 龙佳解 陈磊. 论罗兰·巴特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从“神话学”到符号学的转换[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10). || Long, J. -J., Chen, L. On

Roland Barthes'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Criticism — Transformation from “Mythology” to Semiotics[J].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10).

- 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自述[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 Barthes, R. *Roland Barthes* [M].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6.
- 罗兰·巴尔特. 写作的零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Barthes, R. *Zero Degree of Writing* [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罗兰·巴特. 文之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Barthes, R. *Pleasure of the Text* [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罗兰·巴特. S/Z[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a. || Barthes, R. *S/Z* [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a.
- 罗兰·巴特. 神话修辞术[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b. || Barthes, R. *Mythologie* [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b.
- 罗兰·巴尔特. 符号帝国[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Barthes, R. *Empire of Signs* [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8.
- 让-弗·利奥塔等. 后现代主义[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Lyotard, J. -F., etc. *Post-modernism* [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99.
- 孙秀丽. 罗兰·巴尔特广义互文思想探析[J]. 外语学刊, 2015(3). || Sun, X. -L. An Analysis of Barthes' Concept of Intertextuality [J].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15(3).
-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Wang, M. -A. *Body, Space and Postmodernity* [M].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汪民安. 在语言与身体之间——纪念罗兰巴特百年诞辰[J]. 外国文学, 2016(5). || Wang, M. -A. Between Language and Body: In Memorial of Roland Barthes at His Centennial [J]. *Foreign Literature*, 2016(5).
- 肖伟胜. 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从符号学到意识形态批评[J]. 广东社会科学, 2016(4). || Xiao, W. -S. Roland Barthes's *Mythologies*: From Semiotics to Ideological Criticism [J].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2016(4).

定稿日期:2023-06-08

【责任编辑 王松鹤】